

章可能相对体量小一些,或者可以称之为“小而精”的“文史新探”。

再说由“文史新探”想到的吧,所谓“新探”,要么有新材料,要么有新方法。当然,现在更多是新材料,尤其是新出土的材料。我本人最近两年主要精力在南朝,也关心北朝隋唐,现在南朝新材料较少,而北朝隋唐新出土的墓志、造像很多,利用这些新材料写的论文很多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单篇的墓志考释。个人感觉,单篇墓志考释很难写出有深度的论文,往往需要一组或一类具有相似性质的新材料,或者以新出土墓志为线索讨论新的问题,建议《文献》开放更多的空间给这类论文。而那种比较重要的单篇新材料,似乎可以以简报等形式刊布。

## 目录学再出发

马楠(清华大学历史系)

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主要分支,目前也面临着尴尬境遇。余嘉锡、王重民等先生开拓了目录学研究的诸多方向,研究方法亦随物应机,广有启益。而近几十年除张固也《新唐书艺文志》、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研究以外,可说鲜有突破;目录学的教材、论文,也集中于“某目的分类体系”、“某家的目录学思想”,研究视野狭窄,议题严重固化,甚至对目录的认识也较余、王有退无进。

目录学号为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但片面强调书目编纂过程中的学术理念,不得不说是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之一。《隋书经籍志》称书目为“簿录”,最近其实:《七略》《汉书》、王志阮录固然是书目轨范,《宋书·且渠蒙逊传》所载元嘉十四年茂虔所献凉州诸书,又何尝不是书目?书目既是理念的,更是实践的;既有自上而下的辨章考镜、删并裁断,却更是文员胥吏自下而上点检登录、抄撮成篇的结果,甚至后者才更接近目录的本质。与之对应,研究古代书目,不能全然将之视作某个“目录学家”的学术思想体现,更应看作通过某种具体可操作的编纂方法形成的结果,视作某个时段书籍史的一个截面。

例如《隋书经籍志》例叙撰人职衔,从“可操作性”上考量,绝非魏徵等贞观馆臣逐一考订的结果,必有《七录》等书作为材料来源和编目基础。又如《宋史艺文志》,总叙称以三朝、两朝、四朝、中兴四种《国史艺文志》“删其重复,合为一志”,而分析《宋志》具体操作流程,则当以《中兴志》为蓝本,主要利用《四朝志》进行补充与修订,最后用《三朝志》《两朝志》进行补充修订,“不著录”部分又添入元人所见宋代著述。元代馆臣采用这种编纂方法,道理也非

常简单:《宋史》诸志、会要,如《五行志》《礼志》《职官志》等可在各门类之下从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依次续入;而《艺文志》则是在各二级目录之下以撰人时代生卒先后为次,当然要始于周秦汉晋,因而操作上选取著录书籍最多的《中兴志》为基础、以诸《国史志》补入最为合理。

与书籍史的充分结合,更能激发书目研究的活力。比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如果不去刻意强调其学术贡献,仅将之视作南宋后期书籍史中私家藏书的一个样本,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有趣的现象:陈氏藏书中,刊本以外,抄本依然大量存在,许多抄本是根据刊本传录或补配完全的;《直斋》提要部分,并没有特异的学术思想,大多因袭《中兴馆阁书目》,又抄撮卷首卷尾篇卷题署、隐括序跋大义,敷衍成篇;比对陈氏过录的刊本卷首卷尾篇卷序跋等信息,与传世南宋刊本往往相合,且尤其集中于宁宗、理宗时期。上述观察当能引出更多有兴味的话题:雕版印刷更为实际的意义恐怕是扩展了可供传录的底本来源;书籍并非一经刊刻便可不亡,保证若干年的翻刻周期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

总之,中国古代书目研究并非题无剩义,重新回溯余嘉锡、王重民对书目的理解与认识,充分结合书籍史的前沿进展,其实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。

## 宗教文献研究方法谈

陈志远(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)

感谢张馆长,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谈谈我对文献学的理解和作为读者对《文献》这个刊物的期待。

我的研究领域是六朝佛教史和佛教文献,研究中感到宗教文献的研究方法还有待建立。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,由于中古史料比较少,常常是老师第一课就把基本史料的情况都交待清楚了。这未必说明中古史学者文献功底扎实,而是这一领域的前人业已将文献使用的关键问题解决了。但在中古宗教史领域,就不是这样了,每个研究者都要自己动手解决文献的问题,比如佛典的翻译年代、作者归属,僧传的史源,古小说的辑佚,乃至石刻史料、敦煌吐鲁番的写本等等。

### 同位素追踪法

先以我个人的研究为例,谈谈对佛教文献研究方法的理解。最初我关心的是佛教在中古前期的传播引起的社会变化,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。但当你进入问题的探索时,就会发现佛经特别多,不同的经典、学说构成了具有